

抗战烽火中的清华图书馆员唐贯方

○何 玉

唐贯方（1901年3月2日—1996年12月3日），原名冠芳，字尉谋，广东香山人。1921年，其伯父唐孟伦（清华学堂第一任庶务长）介绍其在清华图书馆工作，直至1971年离休，他在清华图书馆服务了整整50年。他敬业以求，淡泊名利，毕生守望清华园，是我们内心敬仰的老一辈图书馆员楷模。

唐贯方到图书馆时年仅20岁，最开始他的岗位是书刊出纳，后来由于他业务熟悉，不断学习，精通外文，擅长西文书刊采购及读者咨询工作，被清华人誉为“活字典”，与许多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岱孙先生曾回忆：“唐先生历年提出的书刊采购计划，报到院、系审批时，几乎无须改动即可通过，他一个人顶得几个人。”

随着清华图书馆第二期建筑的落成，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和各项业务都有较大的发展。至全面抗战前夕，清华图书馆藏书已达36万余册，成为国内高校中馆舍较大、藏书丰富、管理较为完善的图书馆之一，为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提供了充分的文献保障。

同一时期，日军铁蹄覬覦践踏我神州大地，鉴于华北局势动荡，清华校方开始着手准备南迁，图书馆随之一同进入战火硝烟的动荡岁月。

1935年11月，清华图书馆在时任代理主任朱自清的主持下，秘密进行紧张的贵重书刊装箱、搬迁工作，从清华园火车站将教研工作所急需的图书、仪器四百余箱装上火车秘密

南运。与唐贯方共事多年的馆员马文珍用《装箱歌》的现代诗记下了当时的场景：

这是前辈人智慧的遗产，
我们应当郑重的保藏；
把它们寄到幸福的遥远，
把它们寄到安全的地方。

“快点儿装！”

“慢点儿装！”

又是一箱。

1937年7月，“七七事变”数日后，平津交通断绝。当时正值暑假期间，馆中职员一半都在休假中。在时局未定、图书馆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图书馆进行了以备万一的准备。从“七七事变”到日军进城期间，图书馆员将本馆及各系预装的图书仪器五十余箱及馆中目录文件卡片等，不顾敌军严密检查，运存至城中某处，复续续运。1937年8月5日，日军进入清华园，强占校舍，公物不能带出，多次交涉无



朱自清担任代理主任时的清华图书馆同仁合影，左起第6人是唐贯方，第一级台阶上右2为朱自清先生（1935—1936年）

效。当时图书馆仍藏有中西文图书、期刊以及尚未完成编目的部分丰华堂藏书，总计不下数十万册，只能忍痛割舍。幸好之前运出所有中西文善本、全部地方志及各系需用书籍四百余箱，运存至汉口上海银行第一仓库，连同此次运出者，共约五百箱。

1937年9月，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合建的长沙临时大学成立。1937年12月底，南京失陷，武汉震动。次年，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据唐贯方本人回忆，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正值他南下香港省亲，行至上海接校方通知，便即刻赶赴长沙临时大学，参与学校南迁工作。而老母、妻子和幼儿弱女8人都留在沦陷区北平。

1938年初，学校派他与机械系教师董树屏、化学系助教张光世等专门人员奔赴汉口，抢运滞留于此地的四百余箱南运图书仪器。但此时战火逼近武汉，学校决定改变计划，原计划运往长沙的图书只能先转运至重庆，务必在日军占领汉口前将图书抢运出来。他们经过多方联络，将书籍装上民生公司船只，结果到宜昌时遇到日寇飞机轰炸，滞留码头四个月之久。大撤退时船少货多，而且要考虑水道的情况，等待时间长，分批运输，因此周期长，风险大。唐贯方食宿在码头，身穿雨衣，背挎工具袋，手持钉锤，日夜守护古籍与贵重仪器。三个月后，终于弄到船只，溯长江，过三峡，历时十多天，成功地将四百多箱善本图书运往重庆安置。

西南联大期间，唐贯方实际主持清华图书馆的具体业务。据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潘光旦兼任清华大学图书部主任，而实际主持清华



唐贯方摄于昆明才盛巷清华大学办事处（1939年5月）

图书馆日常工作的是唐贯方先生。小孩子们都认识他，他总是笑容可掬。1938年暑假后，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工作逐步开展起来。西南联大图书馆刚刚成立，图书期刊根本无法满足师生的急切需求，为此，清华决定将汉口运到重庆的图书，一部分运到云南来供联大师生使用。自1938年冬起，存放在重庆的清华图书馆藏书陆续运至昆明，这些图书都是西南联大各系和本校研究所亟需，需要开箱送交联大图书馆转交各系。这项工作手续繁复，每开箱一次到手续完结，非四五日不可；借剩之书又需重新装到箱内以便保存。馆员马文珍又写了一首《开箱歌》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丁丁当，丁丁当，
拿刷子刷刷书面的霉呀，
丁丁当，丁丁当，
让陈死的微尘因风扬。

……

丁丁当，丁丁当，
这箱里放着杜甫和陆游，
丁丁当，丁丁当，
他们又陪着我们逃一次荒。

唐贯方的老母亲、妻儿8人在“七七

□ 人物剪影

事变”后滞留北平，到1938年时离开北平去了香港，投奔其祖母及堂兄唐立达（香港某西药房化学师），至1939年仍寄居在香港的亲戚家里。1939年3月，考虑到战争局势仍在发展，香港寄居生活成本日渐高涨，唐贯方便向学校请假三月，赴香港将妻儿接至昆明生活，一家人得以在昆明团聚。

1939年冬越南时局紧急，学校派唐贯方去越南海防，抢运联大和清华研究所的一批仪器，他在越南花了四个月办理运输工作。1940年夏，唐贯方由越南回到昆明。日寇空袭频繁，清华研究所迁往城郊，他们又将全部图书装运至郊区大普吉镇。唐贯方与马文珍负责组建图书馆，开辟阅览室，为教学科研提供服务。

有一天，在躲避敌机轰炸的时候，一名工友不幸遇难，唐贯方和马文珍幸免于难。后来马文珍在《入滇十首》里回忆烽火连天的情况下整理图书的情景：

警报频传昼夜惊，防空管制动山城。
极目远天寻战斗，弹坠云端震耳聋。
余火硝烟绕翠湖，后方前线两模糊。
一片残阳红似血，坚守空楼整理书。
抗战期间，唐贯方在为西南联大服



马文珍（西南联大时期的清华图书馆职员）
（马缘生提供）

务的同时，先后担任两项兼职工作。1943年，云南教育厅厅长龚自知筹办云南省立昆明图书馆，龚自知兼任馆长，潘光旦推荐唐贯方兼职担任阅览部主任，负责管理五位工作人员，每周三、五到馆办事，每月领米一担，车马费法币一百元，直至1946年复校前辞职，唐贯方作为昆明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的前身）的创始人之一，为发展西南边陲文化事业贡献了力量。

1945年，云南省政府主办“云南留美预备班”，借用云南省立图书馆一部分作为校址，并利用该馆图书服务学生。班主任是清华秘书长沈履，他介绍唐贯方担任该图书管理员，月支出车马费一百元，直至1946年初结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欢庆。唐贯方的儿子唐绍明（1952届经济）还记得当时自己才十几岁，随父亲居住在昆明郊区的大普吉镇，那个晚上宁静的乡村被一阵呼喊声唤醒“Unconditional surrender!”大普吉镇立刻沸腾，人们涌出家门，奔走相告。

抗战胜利后，唐贯方谢绝了昆明图书馆、香港亲友等多方的挽留，毅然携全家千里跋涉，返回满目疮痍的清华园，为清华图书馆的重建而努力。回到清华园后，唐贯方继续兢兢业业，皓首穷经，终老清华。

唐贯方等清华图书馆人忍受着战争时期的资源短缺与生活困苦，时常遭受日军飞机的轰炸，与书籍为伴，用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执着，坚守着一份图书馆人的责任，表现出中华民族刚毅坚卓的精神。他们尽其所能开展各项工作，为西南联大的“弦歌不辍”默默地奉献了八年，作为图书馆事业的后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